

# 略论清初遗民诗人的心态变迁

## ——以遗民诗人集会唱和为中心

卢高媛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杭州 310028)

**摘要:**清代诗人集会唱和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也是研究清代诗歌的一个新的切入点。各类集会唱和伴随着遗民诗人的一生,从这些集会唱和的诗歌创作中可以看出清初遗民诗人的心态在甲申事变、南明灭亡和己未“博学鸿儒科”三次事件后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关键词:**清初;遗民诗人;集会唱和;心态变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8)02-0136-05

清初遗民的整体心态产生过三次较为明显的变化,这种心态的变迁是在不断催化酝酿中自然过渡的,就其结果来说符合时代发展的一般规律。关于心态分期的问题,学界观点大体上是一致的,基本上以顺治元年甲申(1644)崇祯皇帝朱由检身亡、康熙元年壬寅(1662)永历皇帝朱由榔身亡和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第一次“博学鸿儒科”的诏举为标志性历史事件,将清初遗民心态分为三个阶段。丛扬先生在《明清之际的遗民心态》中从历史学角度出发,认为遗民心态受政治环境、民族政策、文化氛围等因素影响,是有规律可循的,早期为“反清复明”的抗争态度,中期为“高蹈肥遁”的隐逸态度,晚期为“及身而止”的软化态度<sup>[1]</sup>。谈及遗民心态变迁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诗歌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蒋寅先生曾说清代诗歌“最直接和全面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内容和艺术趣味”<sup>[2]38</sup>。而诗人的集会唱和在清代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日常化的文学活动,与结社不同,诗人集会是一种相对自由松散的活动形式,没有规章条约的束缚,讲求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往来,是人际关系发展过程中顺应需求而自然产生的文化现象。遗民诗人在集会唱和中抒发情感、谈论时事,这种群体式的交流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出不同时期遗民诗人的普遍心理和情感倾向,对此进行研究也是总结和把握清初遗民诗人阶段性心态特征的有效途径。

### 一 甲申事变后的不屈与抗争

顺治元年甲申(1644),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亡,明王朝宣告灭亡。仅仅一个多月之后,清兵挥师南下,一举摧毁大顺政权,确立了满清王朝对中国的统治。崇祯皇帝的自杀举动对遗民诗人是一个极大的触动,“是其鼓舞,是道义启导、激发,是示范、垂训,是人主施于臣子的最后命令”<sup>[3]24</sup>。激烈的民族矛盾与斗争震撼了广大遗民诗人的灵魂,他们奋不顾身地参与到抗清斗争当中,有的诗人在集会中相互砥砺,有的在诗歌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明确立场和坚定信念。不屈与抗争是早期遗民诗人心态的基调。

这时期的遗民诗人参与或组织的集会唱和普遍规模较小,行事低调谨慎,多为相互信赖的亲友聚会,诗歌创作以砥砺志节、谈论时局为主,风格慷慨悲壮,体现出遗民诗人不屈的抗争意识。顺治二年乙酉(1645),国事日危,清军大举东下,江南各郡相继沦陷,陈子龙拒绝招降,领兵起义,失败后辗转于江南,仍不忘复兴之事。他对明廷连连战连败之事忧心如焚,仍勤于职守,为灾民疾苦来回奔走,直至积劳成病。顺治三年丙戌(1646),陈子龙隐居嘉兴时,常与好友集会吟咏,慨叹世事。他先后经历了师友罹难、至亲病逝的沉痛打击,欲再组义军抗清又遭到阻碍,“沉忧咤叹,至废寝兴。及越、闽失守,志不欲生。……泫然曰:

收稿日期:2017-10-19

作者简介:卢高媛(1990—),女,四川成都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清代诗歌研究。

“苍茫天地，将安之乎？”<sup>[4]下册,751</sup>与友人集会也无时无刻不在牵挂前线的战事，《登山山仙馆同惠朗、胜时作》二首曰：

鳌冠迢递海天分，缙岭笙歌彻夜闻。谷口花深三里雾，楼前鹤下十洲云。羽人佩冷星河影，玉女香消月露文。丹井可能穿地底，裁书谁报洞庭君。

九霄渺渺采真游，松桂回风涧壑幽。云散霓裳金殿晓，月明琪树石坛秋。素琴寂寂依丹灶，清磬泠泠下玉楼。愧我衣冠无息壤，因君羽翰到沧洲。<sup>[4]下册,529</sup>

此时南明隆武帝朱聿键已死，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继位，派兵驻守湖广。“裁书谁报洞庭君”一句表达了陈子龙希望能再次为国效力之决心，“因君羽翰到沧洲”则是对先帝的感怀和思念。这两首诗整体风格遒劲，气势雄浑，充满慷慨激昂的斗志和信念。

顺治三年丙戌（1646），夏完淳投笔从军，辗转于江浙间，遭乱失所后寓居嘉定，有诗《与友人过东道院》曰：“一片江声入晚笳，军中高宴逐轻车。幸陪紫塞将军座，来访黄庭道士家。玉洞花明秋不夜，锦屏云起暮为霞。此身竟逐蓬蓬去，欲叩天门路已暇。”<sup>[5]318</sup>这首诗描写了自己的军旅生活，体现出诗人坚定的战斗信念和凌云之志，甚至已经做好了随时为国捐躯的准备。《九日大风雨同智含夜饮》曰：“高秋夜雨不闻声，旅馆孤灯酒自倾。寂寞黄花千古恨，婆娑宝剑一身轻。风尘握手同兄弟，江海知心托死生。遥忆故园芳草路，满篱丛菊战场明。”<sup>[5]320</sup>这首诗基调悲凉但却不失气概，虽然形势危急，前途渺茫，但夏完淳仍然没有放弃希望，不屈不挠，抗争到底，如同汉高祖所唱之《大风歌》，激昂酣畅，展现出一往无前的壮志豪情。

顺治四年丁亥（1647），陈子龙殉国，夏完淳于同年九月在南京就义，此二人的爱国壮举令人动容，他们视死如归的豪情和以死明志的魄力是这时期遗民诗人不屈精神的完美体现。

甲申事变之后，许多遗民诗人都曾参与过大大小小的抗清武装斗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他们在避难过程中利用集会唱和向亲友述说内心的悲戚和激愤，用诗歌表达内心顽强不屈的抗争意志。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正是这类遗民诗人的代表。顾炎武听闻崇祯帝崩后悲痛万分，遂效命于南明政权，开始了艰难的抗清斗争。是年春，王夫之路过武冈时，结识明王室宗亲朱禋黎，与同乡管嗣裘三人小集，王夫之作七绝二首，题为《逢明王孙，邀同冶仲小饮观伎即席赋。王孙名禋黎，书法妙绝，精禅理，比以请兵平乱，几死于贼》，其二曰：“李长者翻千佛偈，赵吴兴仿二王书。拟君双绝终难匹，报国屠龙誓舍鱼。”<sup>[6]下册,523</sup>诗歌情感深沉，风格遒劲，表露出希望为国效力、尽忠的慷慨义气。顺治二年乙酉（1645），国势危颓，四面楚歌，黄宗羲毅然毁家产、纾国难，募兵抗清，迫于严峻的形势，反抗斗争几经波折最终以失败告终。顺治四年丁亥（1647），衡阳

失陷，王夫之与管嗣裘组织武装力量抗击清兵，无奈己方势力羸弱难以御敌，不久便失败溃退，他又将复国的希望寄托于南明朝廷，在发现其内部腐朽分裂的悲哀现状后感到万分失望。离开肇庆时，友人前来送别，王夫之赋《晨发端州与同乡人别》曰：“海甸见新章，故园入春心。天涯共萋萋，谁能辨浅深。寒潮落沙影，晓塔郁曾阴。日南绝征雁，桂水孤归禽。遥分前渚泪，共湮故人襟。”<sup>[6]上册,135</sup>

顺治八年辛卯（1651）春，顾炎武到南京拜谒明孝陵与先祖祠，结识万寿祺，与其志趣相投，常有往来。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是年条记载：“昆山顾宁人处士炎武过淮上，至草堂，赋诗以赠。”<sup>[7]12a</sup>顾炎武在诗中称赞万寿祺曰：“万子当代才，神情特高爽。时危见縻维，忠义性无枉。”形容自己则是：“南方不可托，吾亦久飘荡。”<sup>[8]296</sup>两人在入清不仕、坚守气节等方面志同道合，相逢恨晚，万寿祺绘《秋江别思图》酬之。是年，清兵攻破舟山，黄宗羲许多好友相继罹难。中秋之日，黄宗羲与弟黄宗炎在上虞观潮，触景伤怀，心中悲戚，赋诗《辛卯中秋与晦木候渡百官江观潮》有句曰：“吾闻其神伍公魄，国亡不救遑身惜。至今杳渺见灵旗，怒气千年留新迹。古来冤愤岂一事，后之视今今视昔。直待万物得其平，朝不为潮夕不汐。人间尚有弄潮儿，乐哀不知鬼神谪。”<sup>[9]第11册,222</sup>此诗抒发了亡国之痛和对友人的怀念，虽有悲凉之感，但却慷慨激昂具有浩然正气。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以后，南明败局已定，为躲避清廷搜捕，黄宗羲逐渐停止明面上的抗清活动。同年深秋，与弟黄宗会等人相聚，宿于积庆寺，《同泽望、芝儿宿积庆寺遇独朗、定空》有诗句曰：“松涛欲泛禅床去，寒叶已将佛迹埋。欲为一番多话旧，反来牵课道人怀。”<sup>[9]第11册,227</sup>思及旧事，黄宗羲心中不免哀痛，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最后希望的幻灭，诗歌情感日益沉郁感伤，但依然坚定坦荡，慷慨悲壮。

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南京的“世盟”集会是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带有强烈政治目的的诗人集会唱和活动。参与者大多为抗清烈士和遗民志士的后代，集会上众人表达了对故国先烈的思念以及坚持抗争的愿望。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甚至“造成集体拒绝参加江南乡试的政治影响”<sup>[10]89</sup>。这系列集会经陈维崧提议，由冒襄负责组织召集工作。其诗《和其年己亥诗韵十六首》之四自注云：“丁酉夏余会上下江亡友子弟九十四人于秦淮，其年首倡斯集，时应制者少，咸为余至。”<sup>[11]395</sup>南京是朱元璋明孝陵所在地，在遗民诗人心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齐聚于此，总能唤起他们内心中最沉重的亡国之痛和激昂的反抗情绪。如戴重之子戴本孝《中秋后四日陈其年、方田伯、吴子班、刘王孙同两儿雨宿秦淮寓馆，即席限韵》二首之一曰：“雨剪秋堂寸烛新，新诗催杀霸陵人。独怜匣剑空留蜕，尚负柴车未脱巾。石破天惊谁念漏，锥无

卓地莫言贫。遥霖更欲消残梦,开眼还堪洗客尘。”<sup>[11]256-257</sup>吴应箕之子吴孟坚和之曰:“十载交情此更新,相看犹是旧时人。鲜衣何必怜腰带,折角遥期整葛巾。赋到秋天增客怨,游经故国愧家贫。酣歌莫负今宵雨,潦倒宁须问世尘。”<sup>[11]257</sup>这些诗歌隐忍中存有骨鲠之气,内敛而不失坚韧,展现出在父辈影响下凛然的气概和不屈的心志。

## 二 南明灭亡后的凄苦与哀伤

康熙元年壬寅(1662),即南明永历十六年,朱由榔身亡,明王朝在大陆的统治彻底结束。随着东南抗清势力的消散,清朝政权日益稳固,中国逐步进入稳定的统一时期。虽然复明无望,但一部分怀有强烈民族自尊和忠义思想的遗民诗人依然无法释怀,坚持守节不仕。他们在经历了一系列抗争失败、理念受挫的打击后,在集会唱和中排遣苦闷,寻求情感上的共鸣,寄托对故国的思念。凄苦与哀伤,沉痛与悲凉,成为这时期遗民诗人心态的主旋律。

随着南明的灭亡,遗民诗人的反抗斗争意识有所消减,但对故国的眷恋和思念之情依然强烈。这时期的诗人集会唱和活动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复苏而有所发展,不再奔波于战事的遗民们有了相对稳定的居住环境,集会唱和活动又再次成为他们日常文学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康熙元年壬寅(1662)秋,屈大均南归故里,陈恭尹在西郊草堂为其摆酒洗尘,所邀请之人除梁佩兰之外皆为拒绝与清廷合作的遗民,陈恭尹《西郊宴集,同岑樊则、张穆之、陈乔生、王说作、高望公、庞祖如、梁药亭、梁颀若、屈泰士、屈翁山,时翁山归自塞上》曰:“黍苗无际雁高飞,对酒心知此日稀。珠海寺边游子合,玉门关外故人归。半生岁月看流水,百战山河见落晖。欲洒新亭数行泪,南朝风景已全非。”<sup>[12]75</sup>陈子升《秋日西郊宴集(时屈道人归自辽阳)》曰:“寥落王风蔓草生,荒郊何意会群英。十年丧乱同王粲,万里归来独子卿。林际远烟鸦噪晚,雨余新月雁窥晴。故园春色携琴在,吟断西楼画角声。”<sup>[13]368</sup>这次集会虽然以迎故人回归为名,但创作中主要表述的仍是对故国的思念,气氛凝重,言辞凄苦,真挚深沉,透露出一种萧索惆怅之感。

这时期遗民诗人的活动范围更为广阔,集会活动更为频繁。其中好交游者常游历四海,或拜访结识名士,或与故交重逢叙旧,在集会创作中常流露出对世事变迁的慨叹以及难以消解的亡国哀思。康熙元年壬寅(1662),阎尔梅路过云间(今上海)时与南下游历的河朔派诗人殷岳相遇,阎尔梅《云间遇同年殷伯岩》二首之一曰:“庚辰二月集燕京,别后中原桔矢鸣。君改冠裳非不得已,予抛松菊岂无情。逃名塞外怜初志,握手云间哭再生。嘉遁看来容易了,樵山渔海事平平。”<sup>[14]458</sup>同年,阎尔梅又往常熟访钱谦益,《钱牧斋招饮池亭,谈及国变事恸哭,作此志之,时同严武、伯熊》曰:“绛云楼外凿山池,剪烛春宵念劳时。鼎甲高题神庙榜,先朝列刻党人碑。邵侯无奈称瓜叟,沈令何言答妓

师。大节当年轻错过,闲中提说不胜悲。”<sup>[14]458-459</sup>同为短暂仕清的贰臣,阎尔梅对两人的态度却有很大区别,他用“君改冠裳非不得已”一句表明对殷岳的体谅和理解,对于钱谦益则用了“大节当年轻错过”这样的评语,讥讽之意不言而喻,不过这种道义操上的谴责最终被“闲中提说不胜悲”的故国哀思所替代。遗民诗人与降清贰臣之间的来往似乎是无法避免的,部分遗民诗人也并不排斥与他们接触,这类集会中往往夹杂着鄙夷与惋惜、嘲讽与理解等复杂的情绪。如康熙二年癸卯(1663)立冬,方膏茂邀钱澄之饮酒,钱诗《滕王阁同方绣山敦四宴集得“风”字》二首之一曰:“滕王高阁耸层空,乘兴登临二阮同。槛外云山余旧恨,城外鼓角送秋风。天时已变江流里,人事常悲昔照中。却怪来游词客少,子安诗句至今雄。”<sup>[15]第5册,235</sup>安徽桐城方氏是明代皖地最负盛名的世家大族之一,明亡后方氏一族境遇凄凉,元气沦丧,除少数人归降清廷之外,大部分族人都选择以遗民的身份终老,而方膏茂就是少数出仕新朝的方氏族人之一,钱澄之在诗中对国变的悲戚和哀愤对于同席的方膏茂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讽刺。

在南方秘密参与抗清活动的傅山意识到复明大业已经渺茫后返回太原,隐居松庄,其间有不少遗民诗人登门拜访,傅山与他们赓酬唱和,表露心迹,共述衷肠。这一年,傅山在亡国的悲痛中过着避难的艰苦生活,诗歌整体呈现出萧索凄凉的情感基调,传达出的深切哀伤令人垂泪。康熙二年癸卯(1663),顾炎武北上至山西太原,访傅山于松庄,“赠五律一章,先生依韵答之”<sup>[16]72</sup>。顾炎武《赠傅处士山》曰:“为问明王梦,何时到傅岩?临风吹短笛,剧雪倚长镵。老去肱频折,愁深口自缄。相逢江上客,有泪湿青衫。”<sup>[8]359-360</sup>傅山作《顾子宁人赠诗,随复报之如韵》和之曰:“好音无一字,文彩会贲岩。正选高松座,谁能小草镵。天涯之子遇,真气不吾缄。秘读《朝陵记》,臣躬汗浹衫。”<sup>[17]上册,244</sup>顾炎武之诗悲切,流露出复明梦碎的伤感之情;傅山之诗肃然,表达了对顾炎武忠义之举的敬意。康熙十年辛亥(1671),阎尔梅来访,傅山绘《岁寒古松图》相赠,阎尔梅赋《访傅青主于松庄》二首酬之,其一有句曰:“桐江梅市前人易,生在如今决不能。”<sup>[18]348</sup>直言当下隐居不仕的不易,即使如此,两人之心依然坚定,在相互鼓励中守护共同的信念。

康熙三年甲辰(1664)春,在扬州召开的“广陵唱和”集会,是这时期规模最大的以遗民诗人为参与主体的诗人集会唱和。清初的扬州虽然遭受了战争的破坏,但凭借着丰厚的历史积累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得以迅速恢复,浓郁的文化氛围和传统的思想学风吸引了来自各地的遗民诗人,他们怀着维护汉文化正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这里找到了精神和信仰上的归宿,这样的民众基础和思想环境为集会唱和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杨积庆《吴嘉纪年表》“康

熙三年甲辰”条记载：“嘉纪在扬州。春与林茂之、钱肃图、程邃、孙默等酬聚，诗酒倡和。”<sup>[19]553</sup>孙枝蔚《溉堂文集》卷一《广陵唱和诗序》写道：

盖闻梁园赋客，不同产而同游；邨下诗人，不殊调而殊土。世虽永传为盛会，事实难望于布衣。若乃绮食雕盘，谁是扶风豪士？银灯璧月，忽遇东平刘生。妙句擘七香之笺，情人来千里之驾，此则可谓萍水奇致，金石古欢者也。甲辰之春，八闽林茂之，鄞县陆淳古、钱退山、杨澐仙、王正子，宜兴陈其年，钱塘蒋别士，海陵吴宾贤，新安程穆倩、孙无言，上人梵伊皆聚于江都。会海陵陆无文亦适奉两尊人至，寓于天宁兰若之旁，遂招诸君开筵春夜，联句城南。谓贫异茅容，不敢重亲轻客，贤如北海亦云：“有酒无忧，坐上交游。”曾闻父母寺中钟鼓报朝昏，丈人安坐之时，出就主人之位。诸侯慢士之日，弥觉君子之恭，当其琴樽倾奏，歌赋和谐，才则如海如江，情则似胶似漆。诸君于是乐莫乐兮，或白发满头，不丧丈夫之勇；或齐眉在远，绝无儿女之仁。<sup>[20]663</sup>

这次参与者接近二十人，均为当时未曾仕宦的布衣平民和山村野老，带有较为明显的政治色彩。陆介祉诗《甲辰春日之广陵，陆无文招同闽中林茂之，三原孙豹人，吾乡钱退山、杨澐仙、王麟友，阳羨陈其年，新安程穆倩、孙无言、王湛若，西泠蒋别士，东臯部方壶，东鲁迕旦庵，海陵吴野人、王眉双，上人梵伊，闽中林祖远（茂之子）大会赋诗》曰：“濡毫兀坐小窗虚，喜得君招春酒书。一壶青醞花发后，满庭碧树鸟啼初。萧疏世事惊身老，谈笑闲情尽夜余。此会不须寒漏促，凭烧高烛且踟蹰。”<sup>[21]第2册·1029-1030</sup>是年正逢崇禎帝二十周年祭、永历帝二周年祭，与会的遗民诗人们已经知道复明无望，心态上已经有所改变，故国对于他们来说是心灵的寄托，同时也是一个苦寒凄清的梦境。

### 三 己未“博学鸿儒科”后的宽容与淡然

清朝自建立伊始便十分注重对汉族士庶的笼络，但许多宿儒名士以名节相高，坚守遗民之志，对朝廷的征召不屑一顾。圣祖康熙皇帝即位后一直致力于改善这种状况，最终决定特别开设“博学鸿儒科”。《康熙政要》卷十六《崇儒学第二十七》记载道：

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圣祖谕吏部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机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

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sup>[22]297</sup>

面对这次征召，遗民诗人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态度明确，坚不应征，如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等人；第二种态度暧昧，消极应付，如孙枝蔚、王弘撰等人；第三种前后态度转变很大，先推辞后迎合，如严绳孙、潘耒等人。这次考试是从是年十一月一直持续到次年三月，朝廷相应的筹备工作十分周到和充分，在录取和授职方面也尽可能破例从优，对拒绝应试的人也一律宽厚待之，以示天恩浩荡。从结果上来看，这次“博学鸿儒科”的举行是成功的，“的确诱惑了很多汉族士子，它对笼络上层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sup>[23]116</sup>。

这次“博学鸿儒科”之后，遗民诗人阵营产生了分化，也是清初诗坛格局转变的关捩，从而引发了诗坛创作主体的消长以及诗歌风格的变化。大多数遗民诗人对新朝的态度开始有所软化，尽管他们依然坚持气节，继续过着隐逸生活，但对亲友、门生的人仕选择逐渐变得宽容，与朝廷官员的往来也更为频繁。这时期的诗人集会唱和已经基本上恢复到和平年代时的状态。对于遗民诗人来说，集会唱和已经不只是他们追思故国、抒发哀思的途径，也是调剂生活、娱乐消遣的方式。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865）秋，杜濬与友人有“送秋”集会，诗《送秋之集再同铨升、练江、南枝用“知”、“心”二韵》二首之二曰：“终朝抱膝不成吟，酒茗同欢任客斟。栗里黄花相问少，孝陵红叶向来深。著书未竟三余业，伏枕空劳九塞心。莫恨征鸿霜后杳，遥遥至日有佳音。”<sup>[24]321</sup>是年又有《十月十日蔡铨升载酒饮我于病榻，练江、南枝二诗衲偕至》：“拟上篮舆散百忧，素交排闥且淹留。情亲各出三年字，身老犹怜一日秋。客舍自晴黄叶雨，钟山不动白云游。持螯快饮成今会，大有齐盟在后头。”<sup>[24]322</sup>此时的杜濬已经年过古稀，诗中表达了他事业未竟、心愿未了的遗憾以及对蹉跎岁月的感慨和哀叹，频繁提及“孝陵”、“钟山”等意象，表明诗人内心前朝旧梦仍在，忠义之志仍存。

三藩之乱后，一些遗民诗人被吴三桂“反清复明”的虚伪口号所迷惑而加入其阵营，但在认清其谋反僭越的私心之后失望离去，加之朝廷围绕“博学鸿儒科”的开展而施行的一系列充满诚意的怀柔政策，让大多数遗民诗人在心态、情感、立场上有所转变。如反清立场最为坚定的黄宗羲和顾炎武也对朝廷修纂《明史》的举动表示支持，甚至提供了不少意见。从遗民诗人在集会唱和时所作诗歌中也可以看出，反清情绪较之过去已经平淡了很多，对故国的情感也变得更为理性。屈大均在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入吴三桂军中任职，三年后即辞归故里，后来在广州城南创立了三间书院，他常与人在书院集会唱和，《早春宴集三间书院即事》[甲子（康熙二十三年，1684）]曰：“海岸犹余

积雪光,春寒绝不似炎方。莺声亦有江南好,梅药从无塞北香。五柳春秋空甲子,三闾歌舞是《东皇》。嘉辰宴会良难得,且共衔杯到夕阳。”<sup>[25]第2册,927</sup>虽然远离战事,回归隐逸生活,但屈大均仍常常思念故国,对相关战事牵挂不已,常在诗中提及屈原,赞颂其高洁的爱国情操,其《奉和澹翁六叔父开春病起之作》六首之四曰:“烟管峰峰枕海平,衡茅相接午鸡声。三闾子姓元南楚,二老衣冠是旧京。骚学自应推小父,人师未敢让诸兄。开春灯火丛家庙,列坐欢娱且慰情。”<sup>[25]第2册,941</sup>回到广东后的屈大均不再远游,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书院的经营。他在《三闾书院倡和集序》写道:“予于城南得陋室数椽,即以为先大夫三闾书院……昔人称三闾骚之圣,圣在道而不在骚,骚有道而后其骚乃圣,吾愿学士大夫从事于斯已。与斯会者若凡人,皆大雅君

子,能别正邪,知道术之所归。”<sup>[25]第3册,285</sup>从序文可以看出,屈大均极为推崇屈原,并以自己和屈原同姓而自豪,他认为屈原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文学上的成就,更在于其忠贞高洁的人格。屈大均将自己所信守的忠义之道作为书院传业授道的思想准则,把遗民精神通过教育传承下去。

这时期遗民诗人的心态在隐逸生活中逐渐归于平淡,注意力也有所转移。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等遗民诗人将全部心力放在了创作和研究之中,躬耕不辍,著述精卓宏富,见解深刻独到,为清初学术做出了卓越贡献;又或者像屈大均一样投身于教育事业,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秉性更是充分体现了遗民诗人始终如一的高贵人格和凛然风骨。他们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和达到的高度是遗民固有心态的升华,也是对旧思想的一种超越。

### 参考文献:

- [1]丛扬.明清之际的遗民心态[D].沈阳:辽宁师范大学,2009.
- [2]蒋寅.清代文学论稿[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 [3]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4]陈子龙.陈子龙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5]白坚.夏完淳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6]王夫之.王船山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7]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M].民国八年(1919)上虞罗氏排印本.
- [8]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9]黄宗羲.黄宗羲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 [10]黄语.论清初丁酉世盟高会[J].深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 [11]冒襄.同人集[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8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 [12]陈恭尹.独漉堂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 [13]陈子升.中洲草堂遗集[G]//丛书集成续编:第151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
- [14]王汝涛,蔡生印.白奩山人诗集编年注[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 [15]钱澄之.钱澄之全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8.
- [16]傅山.霜红龕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 [17]丁宝铨.傅青主先生年谱[G]//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32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 [18]阎尔梅.白奩山人诗集[G]//续修四库全书:第139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9]吴嘉纪(著),杨积庆(笺校).吴嘉纪诗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20]孙枝蔚.溉堂文集[G]//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21]钱仲联.清诗纪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 [22]章侵.康熙政要[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
- [23]张宪文.康熙博学鸿词科论述[J].浙江学刊,1985,(4).
- [24]杜濬.变雅堂遗集[G]//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25]屈大均.屈大均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唐 普]